

中文新世纪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 投稿邮箱:zwxsj2007@163.com

■ 刊头题字:李文海教授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25日

■ 社长:张琦琦 刘寒青 姚思佳
■ 网站: http://www.zwxsj.com.cn

■ 主编:涂好运 朱敏 虞丹瑜
■ 总第 103 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2” 隆重举行



2012年10月3日上午,以“百年学术制度的形成与流变”为主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2”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隆重举行。海内外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宗教和国学等人文学术领域的众多学者齐聚一堂,就百年来中国学术制度形成与流变的基本脉络、基本特征以及在当下发展中面临的难题与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次论坛由我院承办,国学院、历史学院、艺术学院、哲学学院协办,是庆祝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的一次重大学术盛会。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出席本次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主持开幕式及主论坛。人文学术领域众多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百所著名中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莅临参会。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教授、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教授、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教授也参加了本次论坛。开幕式前,陈雨露校长在贵宾室亲切会见了几位作大会主题发言的学者。

首先,视频“百年学术制度的形成与流变”回顾了百年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本次论坛的主题。这一视频是由文学院师生共同制作,以我校学生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旗颂》作为配乐,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向与会学者的敬意,同时更好地带领大家进入本届论坛的主题。

陈雨露校长指出,一百年前,中国教育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知识结构的打造,在思路上是对西方文化走向的一种折射。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下,东方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传统私学开始向公学转化,书院则渐渐向洋学堂过渡。不久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与现代科学精神的相结合,开启了现代学术的新境界。民国呈现出多样的教育生态,北大模式、清华模式、陕北大公学模式、西南联大模式、燕京大学模式各具特色。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教育制度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成了我们今天教育传统的一部分。这一百年教育制度的丰富性,是传统中国文化史与教育史上所没有的。我们今天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延续着前人的诸多话题。

陈雨露校长强调,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催生了现代史上各种思潮和文化事件。北大模式催生了“五四”运动,而有着浓厚革命色彩的陕北大公学模式则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现代学术制度建立的步伐,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发展,无数教育家和学者不断调整思路,提出自己的设想。然而,无论教育理念如何变化,中国人的文化复

兴之梦是从未消失过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渐渐摸索出一条自己的教学制度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为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而积极探索。

陈雨露校长提出,从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和流变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开放性、厚重性、包容性始终是大学建设的根本。既要有纯粹的文化静观,又应有现实的精神。本次大会的召开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也将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及社会思潮的演进。总结百年学术制度,陈雨露校长指出,古代传统固然要尊重,对现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我们也应充满敬意。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最后,陈雨露校长对与会学者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预祝本届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四川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艺术批评家王林教授,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得主,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枫教授,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陈启云教授分别代表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学、宗教学和国学作大会主题发言。

在“百年哲学制度的形成与流变”的主题发言中,刘大椿教授概括了哲学学科在近百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没有独立分化出来的学科形成了现在学界公认的体系化的学科。百年来哲学制度的演变有一些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和西方哲学的引进和传播、传统哲学思想梳理和重新解读相关,更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对于未来哲学制度的建设,刘大椿教授认为,我们应在重视分化的同时,更强调诸学科分支的对话和整合;面向未来的哲学制度建设,则必须以问题意识为本,宣扬超越情怀,回归学术本位和独立思考。

之后,陆建德教授提出,在讨论百年学术制度的形成变化时应当跳出朝代思维的窠臼,采取法国年鉴派的“长时段”的概念。他具体探讨了张之洞等代表人物,认为晚清时期对于后来学术制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提出,我们应当与自己的历史讲和,与我们17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以及1911年之前那些对革命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讲和。最后,他希望我们的文学走得更远,应该像十九世纪末俄国一样,通过伟大的文学树立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

杨念群教授则通过解读百年来中国历史学接受并融合西方思潮的过程,来揭示历史学学术制度的流变。他从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以进化的角度解释历史开始讲起,提出民国以后的史学演变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是来自社会学

的影响,二是人类学研究的冲击。但是,过度的社会学结构分析和人类学田野研究都不足以将社会历史变化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对此,他提出了中层理论。然而,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市民阶层”,因此,这涉及中层理论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从中国历史文化本身抽取概念,并观察它在近代的演变,从而成为重构历史学的资源。

王林教授以“当代艺术教育下的难题”为题,介绍了艺术学教育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导致的艺术教育难题。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社会实践,是一种交流活动,是一种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当今艺术教育的第一个难题是艺术史论的强政治化,第二个难题是艺术教育的非个性化。因此,艺术教育应当做到现代教育方式与传统教育方式的结合。

刘小枫教授则以“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形成的角度阐述了“公民宗教”的必要性。他认为,谈论百年学术制度时不能离开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的发展。他从现代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的源起谈起,提出要达到民主共和,必须通过启蒙将人民从传统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

最后,陈启云教授以“历史、文化、学术”为立足点对百年国学进行概括总结。百年制度流变与西方思潮的进入密切相关,新文化的发展多从模仿西方而来,国学则开始边缘化。在应对全面西化之时,新儒学兴起并予以反击,作为国家本体精神的传承,国学应当超越新儒学。另外,国学研究不可以孤立开来,应当以历史为维度进行考察度量。

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级学术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为海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大研究同仁提供一个思想交流和学术见解对话的高端平台。通过对彼此共同感兴趣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在对话中凝聚共识,在交流中深化合作。本论坛自2001年创建开始,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二届盛会。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2”正值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5周年以及中国最早的大学教育令颁布100周年,以“百年制度的形成与流变”为主题,诚邀海内外各位英才回顾百年学术制度的发展轨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当下学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2”分论坛也在当天下午进行,与会学者将分别围绕“百年哲学史研究回顾”、“百年文学史研究回顾”、“现代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当下艺术教育的难题”、“宗教学研究与现代学术精神”及“国学研究的走向”的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整理:吴静怡)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各位老朋友: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在北京颁布了《大学教育令》和《中学教育令》,中国的教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那时候的教学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价值理念和知识结构的打造,在思路上是现代欧美文化走向的一种折射。中国的大学理念和日本的大学理念,都是从阵痛中建立起来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里,东方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先前的书院式教育渐渐被洋学堂教育所取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心性之学不抵实用精神,科学与个性的发展,成为人们的期待。不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它在知识界渐渐代替了儒释道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精神的结合,使现代教育渐成体系,现代教育功能的多样性日趋显示出其生命力来。教育观念的变化,也是国人理念变化的反映,图强救国的思想,成了支撑大学制度理念的基本元素。

中国百年间的学术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私学向公学转化,书院向洋学堂过渡的过程。在民国,教育的生态是多样的,北大模式、清华模式、陕北大公学模式、西南联大模式、燕京大学模式十分诱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这些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研究话题。虽然学界对各自的模式有着不同的印象,但它们很自然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教育制度,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成了我们今天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百年教育制度的丰富性,是传统中国文化史与教育史上所没有的。我们今天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延续着前人的诸多话题。

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催生了现代史上各种思潮和文化事件。没有新北大精神,就不会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它开启了现代文化进化的先声,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实绩。没有陕北大公学,就不会有后来革命思想的普及和革命干部的培养,它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储备了大量人才,其制度体系已完全不同于欧美教育的风格,具有相当的革命色彩。这是中国社会多样化的需要,也是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优秀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对社会的改良和进步的作用已写在历史的画卷之中。

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无数教育家和学者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一百年来,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的教育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产生了各自的辐射力。中国有志于社会进步的优秀分子,通过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亮色。无论教育理念如何变化,中国人的文化复兴之梦从没有消失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渐渐

贾元昊 / 摄



摸索出自己的教学制度和模式。人民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和许多学校一样,走过了一条难忘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我们总结经验,积极摸索,为办成一所“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孜孜以求。

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和流变给人们的启示是,无论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开放性、厚重性、包容性是大学建设的根本。既要有纯粹的文化静观,也应有足够的现实精神。象牙塔与乡土社会并非是不可沟通的存在,人们在这里既可与古人对话,也可与现实对话。教育是智慧的温床,是培养现代人健全理念和审美意识的园地。在这个过程中,责任感、使命感是不可缺少的。大学乃广大无涯的精神之地,不仅要有大智大爱的土壤,更重要的是应有博大胸怀的大师和学子。在这里,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还是西方的现代教育,都给了我们很好的经验。感谢这些遗产,它们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事业进步的重要参照。

今天,来自各地的知名学者云集在此,总结百年学术制度,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盛事。古代传统固然要尊重,对现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我们同样应充满敬意。会议上大家将就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学、宗教学等重要话题,进行广泛的交流。人文研究,是大学学术舞台的迷人领地,它往往最有历史感和精神的厚重感。“五四”那一代人就说过,未来的文化不都是复古或者西化,乃是“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这就需要摸索,需要创造。学术史告诉我们,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正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我们的论坛不仅会给大家带来积极的研究提供参照,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演进,无疑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信这次会议将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新风,给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期待着大家成果的发表,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蓬勃的生机。

最后,再次对各位学者、来宾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祝大家圆满成功!谢谢!

(整理人:王宇)

陈雨露校长致辞

百年学术制度的形成与流变

百年哲学制度流变

刘大椿



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哲学制度百年来的形成和流变。晚清之前,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哲学传统和丰富的哲学内涵,但哲学学科并没有从大文科和一般的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关于哲学学科的真正出现,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北京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哲学学科,另一个是胡适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之后,体制化的哲学才得以逐渐地形成,也就是说哲学学科的产生是近百年来才有的事情。

中国哲学制度的演变有一些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主要和以下三方面的发展有关:第一个是西方哲学的引进和传播;第二个是对传统哲学思想的梳理和重新解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现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的理念层面(也就是哲学层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背景。比如“五四”之后西方哲学的引进,杜威和罗素等人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引进和传播;再比如,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发掘和分析古代文物文献的热潮,这些新的史料提供了新的历史观,也给哲学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材料,有力地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而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这是哲学制度流变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也是和西方哲学的传播,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梳理、重新演绎和诠释,和中国近代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

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的制度建设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有了可喜的变化。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系统已经在大学确立下来,在学界也被公认。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哲学百年流变中所形成的学科的基础,其他的分支学科,像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和逻辑学也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诸方面取得了特别的建树。到今天,哲学已经成为一个体制化的系统。

随着我们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当下哲学制度的建设在重视方法的同时更应强调诸学科分支的对话和整合。哲学已经分化成为我们通常所认可的八个分支学科,而它现在还在分化,但是在分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话和整合。因此,面向未来的哲学制度建设应该针对根除多年的积弊和建构当代哲学的需要,高扬问题意识和超越情怀,以问题意识而不是它自身的体系为本,在注重哲学效用的同时更要有超越情怀;另外,在大学和学界还需要倡导学术本位和独立思考,把学术作为推动哲学制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活跃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的哲学大师,并与我们中国伟大的现代化事业和当代世界进程相适应。谢谢!

(整理:吴晓瑜)

当代艺术教育难题

王林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2”大会主题发言中,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王林教授,在对艺术进行精深的解构之后,着眼于当下艺术教育的难题,从一个艺术批评家的角度对当代艺术教育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林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对艺术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简要的阐述。他提出,艺术学是离科学最远、离人文最近、与社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因为艺术不是科学,研究艺术的学问可以被称为学科,但不可以完全科学化。因此,艺术教育与理工科科学教育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并不完全一样。其关键在于艺术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交流活动,是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艺术学现在之所以成为与文学并列的学科,正是因为百年以来视觉传媒和视觉文化的发达。

除此之外,王林教授还概括了美学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他认为,美学研究的核心是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另外还有美术批评和美术传播,而重心在于美术批评。而美术史内部又有形态学的变化,王林教授将其主要分为原始艺术的混合形态、古典艺术的统一形态、现代艺术的分离形态和当代艺术的综合形态四个阶段。在不同的形态内部,发展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在不同形态之间,发展是死道理。在艺术史上,变化比发展更重要。

(整理:胡馨予)

中国学制变迁与新文学

陆建德



在热烈的氛围中,陆建德教授首先表示自己非常荣幸参与此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他非常谦逊地表达了自己个人在文学研究方面建树的有限性。

接着,陆建德教授追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维度和合作。其后,他从蔡元培时期的朝代思维讲起,开始简要地谈论中国百年学术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讲到朝代思维,要从民国开始,从蔡元培开始。蔡元培在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不得不向在北京的外国银行伸手。那时候的办学条件和学术研究条件,不可谓不艰难,这是我们历史的痛楚。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依旧建立起了京师大学堂,蔡元培在北大也突出了教育部的作用。陆建德教授指出,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回避其背后种种复杂的权力斗争,毕竟我们希望并且需要有一个国家观念的统领,从而走出帮派或者党派思维的模式。

陆建德教授指出,在学制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张之洞起了极大作用。当时中国建立的大都是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因而中国的传统学术一度是被轻视的。怀着保存我们自己的国家文化的心愿,张之洞写了《存古学堂折》,这实际上是中文系的来历。其后,他又上折请求建立图书馆,这对文学学科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陆建德教授指出,我们强调国学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新旧文化的接触。

接着,他讲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域

史学流变与中层理论

杨念群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2”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针对近代中国历史学的百年流变进行了别具一格的阐释。

杨念群教授指出,从梁启超先生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撰写的《新史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学流变历程,近代历史学的百年流变便与不断接收和融合西方的思潮息息相关。《新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用进化的态度来寻求历史学中的公理。梁启超先生提出的这一个方向后来出现了很多的分支,但西学大潮对近代以来史学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

民国以后的史学演变大致有两条线索,第一便是来自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讲究长时段的对历史进行分阶段的理解,这种波浪式的推进展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面貌,第二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社会学对历史的把握主要侧重于其长时段的结构性的演变,但缺少对以人为本的活力的动态的关怀。人类学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学研究的这种局限。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开始回避宏大叙事的历史观,而是关注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进行区域性的研究,即眼光向下的民众史的研究传统。在这一层面上,人类学的介入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基本框架。

但杨念群教授也提出了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人类学研究注重在基层社会里详细描述日常生活里发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现象,但这种描述缺乏一个界限,容易导致历史记录的碎片化,缺乏对历史整体的认识。如何从一个更细节的角度上升到一个更加整体的层面来理解中国历史是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过度的结构分析和过度的经验分析都不能展示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如何融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长处、克服两者在历史学研究中产生的问题是历史学面临的非常艰巨的任务。针对这个难关,杨念群教授在发言的最后简要提出了中层理论本土化的观点,借鉴中国历史文化概念,观察其在近代的演变并重新应用它们来分析中国历史常见的现象,进而重构百年以来的历史学。(整理:汪杰 梁文婷)



宗教学的尴尬

刘小枫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2”大会主题发言中,刘小枫教授首先提到,中国百年学术制度离不开百年来的追求。

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民主共和政治。而对于共和政治和民主共和政体,西方的宗教学研究有两种观点:第一,我们现在追求的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是由西方的历史演化而来;第二,我们现在追求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是由西方近代的几个哲学家设计出来的。假设后一理论成立,那么自由民主政体则可被认为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人民主权。刘小枫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构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把这个权利交出来就形成一个统治秩序。他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最基本的原理。

接着,刘小枫教授从“启蒙”和“凝聚”两方面说明了自由民主共和国的建立问题,这两方面都与宗教密不可分。“启蒙”就是把人民从传统的宗教中解放出来,包括摆脱传统的宗教。在没有人民主权的时候,宗教和法律的结合规定了每个人的存在位置,这就决定了打破宗法秩序是建立自由民主共和国的首要之务。

当然,只有启蒙是远远不够的。在有了人民主权理论与自然人理论后,我们在启蒙阶段就把中国人传统的凝聚力化解了,因而,自由民主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把人们重新凝聚起来,这就离不开宗教。马基雅维利说过:“宗教对于派遣军队、集合平民、使人善良、使坏人感到害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离不开宗教。由于启蒙时期传统的宗教已经被破坏,就必须再造一个人造的宗教,即“公民宗教”。刘小枫教授指出,公民宗教要和自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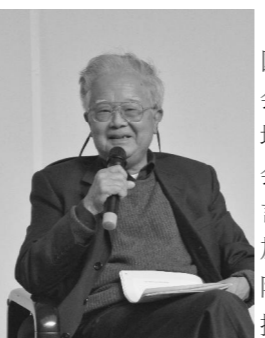


(整理:朱彩婷 欧莫若)



从历史看中国文化

陈启云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2”大会主题发言中,美国加州大学陈启云教授站在一个汉学家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全部的历史进程中。

他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国学,不仅属于哲学问题,更应该是历史问题。因此,他从历史这一角度对中国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精深的概述。

李约瑟曾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即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史学是万学之母。因此,它就要解决到底中国文化里面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也就是“李约瑟难题”。有学者提出,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技术处于相当先进的地位,而史学无法为科学提供高明的、足够长期的积累。但是,陈启云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违反历史的。比如,哲学存在于西方,而现代的科学是出现于西方,因此,推理出由哲学产生科学这一命题,但是从西方历史来看这种推理是不合理的。古代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都处于世界前列,但自从古希腊灭亡以后,便已经消灭

(整理:梁文婷)



百年学术，路漫漫其修远兮

——孙郁院长文学分论坛总结发言

今天下午的会议让我很受启发，也令我很感动，虽然是聊天式的，不是正襟危坐的学术报告、发言，但大家都从各自的背景和知识结构出发来讨论百年文学史的话题。

大家从各个角度对学术体制、对宏观的社会环境，以及学者自身的状况进行了很有趣的梳理，给人很多的启发。而且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从国外来的，或者留过学的老师，他们的经验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有了大致的了解。

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培养了无数人才，其实我们在座各位都是现代学术培养出来的，我们在庐山里面可能会看不清问题。今天谈的问题有些只在表层，但是也有些延伸至深层，我想后人可能更清楚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这些尴尬。

谈及百年学术，特别是学术制度和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相关的话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宿命的因素，我们在这样一个宏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结构下讨论中国的学术，肯定有些问题我们不能够深入地触及。但是，我想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到，那就是杨联芬老师所讲，我们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底线、自己的操守，坚持一种精神追求，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据我所知，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学术制度上都面临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智慧被抑制住，不能得到深入的生长。就像郁元宝老师所讲，我们大学



王建睿/摄

不能够为社会提供智慧的表达方式。民国时期的情况还较可观，后来就越来越八股化。如果高校学术八股的话，这将是民族文化的灾难。

当然现代性的因素给予了我们学科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在座的老师，包括研究生同学，大家也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我刚才听了一些老师的发言，有些思路对我们今后的治学都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这些经验非常重要，在座的同学们你们聆听这些老师们的教诲，其中的经验对我们年轻一代很有意义。少走弯路，在精神之山上不断攀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文学院举办这个座谈会的原因，回顾我们的学术制度，回顾先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寻找一种新的思路。

我想起今天上午王林先生的发言，他讲学术应是在民间。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学术应当是多元化的，它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学术建构，而是自下而上的，这个思路比较符合“五四”时代的传统。当代的现状可能和我们历史上所走的弯路，以及我们的前辈在一个残酷的环境下所作的无奈的选择密切相关。这个话题有其沉重的一面，也有勾起我们重新思考、促使我们去创造的一面，是非常丰富深远的。

感谢大家的精彩发言，希望各位老师经常光临人民大学。我们争取举办更多的聚会，讨论一些彼此关心的话题，因为这些话题关乎我们的学科，关乎民族文化的生长，也关乎到民族的命运。最后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张永清老师也参与了会议的主持。（整理：周爽）

海外学术制度研究参考

2012年10月3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2”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人文学术领域众多知名学者就一百年来学术制度的流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文学分论坛上，关于国外学术制度方面，黄子平、寇志明、董炳月三位教授结合各自在国外高校的工作经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黄子平教授。黄子平教授在讲话中谈到京都大学的学术制度问题。他从学校校庆模式的角度出发，说明京都大学的学术制度与中国的不同。黄子平教授提到京都大学的校庆没有彩旗飘飘，没有巨型蛋糕，没有遍地开花的海报，而是开设了以批判京都大学一百年来所犯的错误为主题的各类研讨会、报告和讲座，让校友和各界知名人士检讨京都大学一百年来所犯的不足。对此，黄子平教授提出一个疑问，大学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机构，能犯什么错误要把它放到历史事业中去自我检讨？他认为，京都大学在日本的教育史上扮演的是一个“左派”角色。京都大学是个善于出左翼思想家和政治人才的地方，因而，他们才会有这样一种历史的自觉去反省作为一所大学在历史上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接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中国研究系主任寇志明从三个方面谈了国外的学术制度和状况。第一，美国和澳大利亚教育制度差异很大。首先是学年制不同；美国是四年制，而澳大利亚是三年制；申请硕士博士的评判条件也不同；美国主要强调上课时的表现，课堂分数占总分比重较大，对研究生的要求大部分都在修课、学外语方面，其次是考试；美国论文放到最后，而澳大利亚主要根据光荣学士学位论文的分数来决定；论文审核者不同；美国一般是校内审

核，而澳大利亚绝对是校外审核。第二，在澳大利亚学术环境方面，他提到，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大学的行政人员把金钱看得愈发重要，他就此引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莫问其收获，问其耕耘”。澳大利亚太注重收获，而忽视了耕耘的重要性。第三，在汉学边缘化问题上，他提出，过去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学，而现在汉学兴起，学生资源的有限性又导致了中文系与其他学科的矛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内和国外学习汉语的矛盾，导致中国越强，中文系越弱。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董炳月教授则发表了他关于国外学术制度的看法。董炳月教授主要提到的是东京大学。他指出，东京大学的文学部不存在中文系、文学史，不管是国文学（也就是日本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文学史一般是由作家做结论。由此，董炳月教授表达了对文学史课程的反感。他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现代文学的面貌已得到呈现，而文学史的作用仅限于文学研究。例如，日本最近编的一本《道德文学史》，其编写方式和我们的文学史差异很大，它直接从作家及作品入手，所以说虽然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受日本影响，但实际的发展完全不同。同时董炳月教授还提到了东京大学的开课情况，东京大学的文学部设立了文学史，但是他们直接从作品作家进入。

从三位学者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中外的学术制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能说明优劣高下。中国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借鉴他国学术制度的精华，保留本国的优秀传统，积极推进学术制度改革，促使中国学术制度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整理：柯丽珍）



谈现代宗教学研究的“脱敏”问题



2012年10月3日下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2”宗教学分论坛在逸夫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论坛就“宗教学研究与现代学术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卓新平教授、王晓朝教授、游斌教授等知名学者先后发表了主题演讲。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教授主持。

卓新平教授率先就“宗教学研究与现代学术精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代学术精神跟我们宗教学的命运密切相关。我感觉，中国这百年来，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是振兴发展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学术认知上走向歪路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一百年来存在太多重技术而轻精神的问题，尤其缺乏人文精神、人文境界。”卓新平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学术精神一定要有自我反省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今天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宗教学，要依靠三个“开”，即“开放”、“开明”、“开拓”，只有这样才有发展未来的希望。

卓新平教授还提到，宗教学在开创之初便背着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一方面我们要自觉甩掉，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社会的力量。目前宗教还是没有“脱敏”，敏感的宗教什么时候能“脱敏”，宗教学发展什么时候就有希望。但是，这个“脱敏”是坐等不来的，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要求敢于创新，而不是在虚无中创新，而是在我们人类文化所积淀的坚实的基础上进行。所以要対以往的学术传

统进行吸纳，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卓新平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就是海纳百川、多元融合，中华民族从创立到今天的发展壮大，都在不断地吸纳融合各种因素。所以，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学术传统和精神传统不能丢；另一方面也不能固步自封，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学术。上下五千年的积淀使我们能够厚积薄发，现在需要等待发展的时机，而这个时机还要靠时代的努力。

他指出，宗教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属于非常薄弱的环节，但是，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于学术要有灵魂来讲，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宗教学研究的是人类信仰问题，而人类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又让这种信仰带来了希望、光明和前景。信仰具有一种前瞻性，属于未来学的范畴，处于实实在在的人类本性中，因此，宗教学是值得发展的。

对此，卓新平教授希望借助各种各样的论坛，理直气壮地研究宗教学，探讨和研究宗教学的意义和它发展的前景，从而使宗教学得到整个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让国家领导人和决策机构认识到宗教学发展跟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是息息相关的，不容轻视。同时，他对这一代以及后代的学子寄予了自己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耕耘不辍。

接下来，我校何光沪教授阐释了宗教学与宗教研究的含义。他认为，

中国的宗教学始于一百年前，是一段从“凤凰涅槃”到“凤凰共舞”的历史。二十世纪初期，虽然国难当头，革命战争不断，但陈垣、陈寅恪、汤用彤、胡适之等学者还是做了很好的开创工作，为中国宗教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把它大大向前推进。他们当时的成就，同西方学者相比丝毫不显落后。1949年以后宗教学就死亡了，因为当时的宗教逐步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开始是口头上的，思想上的，最后采用了行政手段和措施。中国大地上好像没有了宗教的痕迹，“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重新恢复活力，宗教学重新兴起，这就是“凤凰涅槃”。这主要依靠了广大宗教学者的努力，他们经过自己的认真研究，与批判的对象直接接触，对宗教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接着，何光沪教授又阐述了自己对学术精神“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精神”的看法，他对这种精神是否仍然存在表示怀疑。他肯定了马西沙教授“你认为正确的你就这么去做”的观点，并补充道：“你认为错了就马上改，并坦率地放弃以前的观点，做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宗教学的历史非常典型地说明，自由之精神、学术上的自由是一个学科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这也是学科研究的灵魂。何光沪教授结合自己在俄罗斯的旅行感受，谈了自己对宗教的认识。“关于

中国的宗教，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关于中国的主流思想，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在现代还是应该具备现代学术精神，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这种理性的精神，这是学术需要的，也是社会需要的。”

随后，我校校友、中国政法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俞学明教授对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的意向作了说明。他期望把中心做成一个平台，用多学科和现代的学术精神，用这样的一种理性、一种学术、一种态度去研究学术问题，用学术去推进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是纯粹

直接面向现实的领域。随后，他就宗教“脱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我们现在肯定对宗教存在相对歧见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宗教学者的推进，可能也会导致把宗教的问题过于凸显的偏向。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过敏。”关于贯彻现代的学术精神，他比较倾向于学者应做好自己的份内事，“我们当然要有社会批判，承担社会良知的责任意识。任何一个时代真正能够承担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人，坦率地说都不太会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真正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这些学

者，可能很难保持这样一种独立性。”他更相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学者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在现实的环境里积极地、一步一步地脚印地推进，而不是简单地表达一个愤青式的组合。虽然在每一点的推进中自己可能会陷入困境，但只有在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呼喊中，社会才会慢慢地往前走。”他认为，在当代环境里面，担当和责任有的时候可能比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更现实。

（整理：周晓）



王建睿/摄

国学的未来：继承传统，走向世界

2012年10月3日下午,以“国学研究和教育的走向”为主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国学分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122会议室召开。分会由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刘志琴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学院诸葛忆兵教授等。

刘志琴研究员指出,命途多舛的国学在当下面临着政治化和信仰化的挑战,但它作为精英学科应该是纯粹的。另外,他还提到“自证”一事,即证明国学这样一个学科是能够兴旺的。中国一百年没有建立自己的哲学史,在以往只是西化的产品,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学研究不够。哲学等分学科对原义研究的呼喊似乎令国学看到了兴旺之迹。

吴光教授认为,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释道为主体、兼用诸子百家之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基于此,他汇报了自己在道家问题、儒家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批判了现代新儒学只是把民主作为制度之用,还提出了“一道五德论”,他提出,新儒学应走向新心学、新礼学、新经学从而进入新仁学的形态。

周桂钿教授简单地提及了几个观点:第一,考察世界上各国的优势、劣势,应该从世界历史宏观的视角来看,不要只看一时、一事、一地;第二,国学应该是一级学科;第三,哲学分为求真科学哲学、求善的政治哲学、求美的艺术哲学;四、中国的和而不同反对霸权主义、奴隶主义,这与西方的优胜劣汰不同。

肖永明教授认为,国学作为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要避免学科切割对精神的损害,引入西方资源有利于人才往前走,但要处理好本科教育中传承传统与传授西方社会科学的关系。孙劲松教授呼吁学科设置的改良:“国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要有所分割,信仰、政治、国学三者不应排斥或同化。”由于中国从上而下的学科体系体制以及学科内部概念界定不一都带来了麻烦,所以他又呼吁国学院学科建设要有立足点。

钱志熙教授就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旧和新的转变的问题进行发言。他认为,旧学在自身和方法流变中被取代。怎样在这个时代把它重新发展出来,怎么消解旧学与当下社会文化的矛盾,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

如果说上半场是思想的百花齐放,那么下半场则多是思想的交锋与碰撞。

首先,马克锋教授就针对一级学科的追求提出国学尽量不要政治化。国学和政治,现代教育的关系应允许人们争论。国学要学会“苦撑待定”,不一定要借助政府力量。

杨庆中教授对文史哲学科体系的反思入手,他认为,今天国学其实是对文史哲学科体系的完善。西方的学科体系除了文史哲之外还有古典学,从对应的角度上来讲,国学这个学科跟西方的古典学去对应是比较合适的。他还提出,国人对传统的敬重远不及西方,物欲的社会需要国学做生命导师。

韩星、杨庆中、诸葛忆兵、陈壁声、陈伟文、袁济喜等学者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最后在黄朴民院长充满感激与希望的结束辞中,分会圆满落幕。正如最后袁济喜教授所言,关于国学研究的走向见仁见智,争论在所难免且会永远持续下去。人文学本身是一个科学加猜测的过程,众家之争也会为国学发展提供新动力。

(整理:许鑫辉)

艺术教育：戴镣铐的艰难舞蹈

2012年10月3日下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艺术分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教授主持,以当下“艺术教育的难题”为主题。出席论坛的学者有四川美术学院王林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汪民安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周海虹教授,吴粤北教授,清华大学周爱民教授,北京理想创意设计公司邵新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王文娟教授、祝东平教授、陈浩教授等。

首先,王林教授提出,当代艺术教育的难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史论教育的强政治化问题。他以美术史的不同形态为例,指出应该用变化的观点去看待美术的发展过程。第二个是当代艺术教育的非个性化问题。他认为,艺术教育更应该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结合,而不是整齐划一的现代课堂教育方式。

陈传席教授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界定:以创造和宣传文化为职业;必须关心人类命运和国家前途;要有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在教师的神圣性问题上,陈传席教授批评了现在教授评定的随意性。另外,他还提到了史论的重要性,教授招生的自主性、教授的职称评定和国家画院等问题,观点鲜明,切中时弊。

周海虹教授在艺术招生规模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规模与质量发展不协调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国民感性素质低,感性智慧不足,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感性文明水平低,这是我们国家目前最严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降低招生规模,是不利于国家和未来艺术的发展的,应该培养公民的审美要求、审美素养,大力发展艺术教育。

汪民安教授提到,艺术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有限的生命能够无限地延迟下去。接着,他对周海虹教授提到的艺术工作者问题进行了补充,认为艺术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太狭窄了,应该打破专业知识的栅栏,提高人文素养。在艺术体制问题上,他还说:“艺术不应该被体制化,不应该被学科化,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创造性。”

吴粤北教授认为,当艺术真正全面进入商品化时代时,学生和教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艺术的性价比提到一个最大值,由此所快速建立的创造性思维模式是值得怀疑的。针对现在全国都以职业教育为中心的问题,他认为:“面向岗位的教育,应该是给职业学校的;面向职业的教育,应该是给专科学校;面向专业的教育,才是本科院校的主要任务,面向学科的教育,才是研究生及其以上教育的职责。”

周爱民教授强调了当代艺术教育的两个方面即素质教育与精英式专业教育的脱节。他认为,我们只有更多地通过综合的人文知识,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工作中,才可能真正地解读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从艺术自身来讲,很多艺术工作者除了自身的技术之外,综合的人文知识是很缺乏的,他呼吁更多像吴冠中先生一样综合的、有创造力的人才的出现。

理想创意设计公司的邵新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教育思想问题作了阐述,呼唤艺术教育要热爱艺术、为理想而奋斗。邵逸扬教授指出,当今艺术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希望能有一个科学、公正、透明的体制,这样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姜万通教授就艺术的形式化问题,中国的教育理念问题,招生质量问题、艺术与真善美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最后主持人徐唯辛教授总结了这次论坛中各位专家所提出的关于艺术教育的问题,希望大家带着问题共同思考、沟通,想出解决的办法。

(整理:冯海敏)

2012年10月3日下午,以“现代史学在中国的兴起”为主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历史分论坛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社科院世界史研究员赵文洪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侯树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考古学魏坚教授、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等先后发言,孙家洲教授最后作点评和总结。

首先,朱孝远教授、赵文洪研究员等就其世界史研究领域发表了主题演讲。

朱教授对我国的文艺复兴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学者们之所以获得如此出色的研究成果,是因为他们乐于用学向奉献社会,且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其次,他比较分析了几位学者对近代国家政治起源的看法,提出“全面地看问题”的研究观念。

赵文洪研究员就世界史学科“网络化”、“国际化”、“饱和化”的现象和趋势发表了观点,并对“史学学科怎样维护和增加自己的独特社会价值”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提出“要以国际史学舞台作为自己专业研究的基本背景或者工作平台”、“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的问题”、“努力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等期望。

接着,魏坚教授、齐东方教授等对考古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魏坚教授从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兴起谈起,详细阐述了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历程,进而深入讨论了“中国考古学定位以及与历史的关系”这一话题。他指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中国考古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脉络,我们学科的成绩已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与未来接轨打下了基础,取得了发言权”。

齐家洲教授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方式的改变说起。他表示,考古学不能只在自己的圈子里进行,需要各界的配合。中国的考古学从盲目的信古到疑古,再从消极的疑古到积极的考古,渐渐也明白自己既要有独善其身之情,也要有兼济天下之志。最后他总结到:“考古学走出象牙塔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这对塔内塔外都是大有作为的。”

陈其泰教授、郝春文教授、吴光教授、曹新宇博士就其中国史研究领域发表了主题演讲。

陈其泰教授从民国初年史学研究的新格局说起。他表示,今天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繁荣发展的主要原因。他从各个阶段的史学活动,以及各个时期的创新特点来进行探讨,总结出今天发展新史学有哪些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最后,他说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把前辈的经验好好学过来,以我们的聪明才智好好创造,那我们新世纪的史学就一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郝春文教授主要从两大问题着手进行介绍。首先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接下来是敦煌学研究的五大阶段及每个阶段的特点、成果等。郝春文教授认为,当下应该抓紧人才培养,他希望我们和外国朋友一道,把敦煌学研究深入推进。吴光教授认为,新史学更多的是向人文学和文化学方向发展,考古学家在做定论的时候应该谨慎。曹新宇博士通过对画册细节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片断让大家知道中国形象不是一个单线性描述的历史,很多东西已经在历史中被淹没掉。”

最后,孙家洲教授对这次论坛进行了总结,请大家指出这次活动的不足之处。他对青年教师表达了殷切的希望:“他们非常出色,有很好的学术潜力,相信他们的发展会很好。”

(整理:任汝茂 邵宇杰)

追溯·展望 百年哲学史研究回顾

2012年10月3日,以“百年哲学史研究回顾”为主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哲学分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417会议室举行。哲学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对1912年以来学术制度的基本脉络、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研究。本场大会由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担任主持,哲学院陈先达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俊人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张学智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领域的著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等先后进行发言。

陈先达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百年哲学史的两个特点并探讨了中、西、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门哲学的关系。就理论上如何真正地为中、西、马对话创造条件,陈先达教授强调:“一是防止再度边缘化;二是怎么样利用现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做好中、西、马的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和各部门学科同时得到发展”。

王俊人教授就伦理学作了发言报告。

郝立新教授评价说:“其实刚才从万教授的发言当中,我们也感觉到伦理学科和很多其他哲学学科一样现实性很强。社会发展、科技发展同伦理学科本身发展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国内与国外的差距,我们在现实的伦理学关注当中如何寻求一些理论依据,我们方法论的建筑等”。

接着,李德顺教授紧扣大会的主旨主题,讲到学术制度、学术思考观点的一些流变。李德顺教授强调:“我们这个学术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制度体系现在需要反思,制度无非就是把人组织起来做事的那套结构和规则。”他认为,学术制度应该至少由这五个方面构成:学术机构制度、学术人才的支持制度、学术资源制度、学术规范制度和学术评价制度。

张学智教授认为,中国哲学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哲学。“从西方哲学得到的分析方法可以把一个哲学系统掰开来,获得很细致的、很平面的、很窄的观点,然后再从中提炼出好的东西”;“我们要搞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要贯通中西、熔铸古今,因为在现代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搞所谓原汁原味的东西

是绝对行不通的。”

邵逸扬教授对中国哲学发展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百年来可能是一个以向西方学习为主流的过程,因为原有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我们学习西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就走不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使得中国的哲学现代化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东西方文化本土和现代、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和冲突是很多的。经历了百年的时间,我们要问:真正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哲学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回答说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

宋志明教授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提出自己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哲学研究不够哲学且没有历史。龚群教授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谈论了现代政治哲学,并从政治哲学角度就前面一些教授的发言作了提问,接着

陈先达教授对其做了补充。

最后郝立新教授提出了关于哲学的边缘和中心,建设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哲学体制性、规范性弊端等问题,并对参加这次会议的教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希望能把这次会议的内容整理出来呈现给更多的读者。

(整理:胡郡)

责任编辑:冯海敏

编辑:许鑫辉 卢多果 肖羽彤

美编:杨颖

